

信任的流失：一二八事变前后的陈铭枢与蒋介石

肖如平

〔摘要〕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日渐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发展到互相猜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双方在抵抗的程度上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并由分歧走向了决裂与对抗。其关系之恶化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皆为重要原因。

〔关键词〕 一二八事变 陈铭枢 蒋介石 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是陈铭枢和十九路军由拥蒋到反蒋的重要转折点。此前,陈铭枢属拥蒋派,其领导的十九路军亦是蒋介石非嫡系的“嫡系”。然而,在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与矛盾,并逐步走向了决裂,最终导致了福建事变。关于陈铭枢与十九路军由拥蒋到反蒋,发动福建事变,学术界已取得显著成果。^① 本文试图利用蒋介石档案、蒋介石日记和《陈铭枢回忆录》等资料,对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在一二八事变前后关系的恶化作一简要分析。

一、为蒋走“天涯”

自1927年宁汉分裂到1931年宁粤对峙,陈铭枢均力挺蒋介石,与蒋共进退。他所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成为蒋介石非嫡系的“嫡系”,在蒋排斥异己、制衡西南、“围剿”红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拥护党权、反对独裁之斗争。其时,支持蒋介石的部队除黄埔嫡系外,主要有留守广东的李济深部和桂系的李宗仁部。而武汉方面有唐生智、邓演达、张发奎和陈铭枢等实力派。其中,唐、邓、张三人服从武汉中央,而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则倾向蒋介石。^② 1927年2月,在蒋的拉拢下,陈铭枢决心脱离武汉,追随蒋介石。3月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反对蒋介石独裁。会议期间,陈铭枢乔装离汉赴赣,“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③ 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陈铭枢追随蒋氏出任政治部副主任。是年

8月,宁汉合流,蒋介石被逼下野,陈铭枢也随之辞职出洋。

1929年,蒋介石扣押李济深时,广东将领纷纷主张用兵,唯独陈铭枢反对。为此,蒋介石任命陈铭枢为广东省主席。同年,陈铭枢的第十一军被编遣为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师,由蒋光鼐、蔡廷锴分任师长。1930年中原大战时,陈铭枢命蒋、蔡两师继续追随蒋介石,先平张桂联军,继克晋军,再攻济南。同年7月,蒋、蔡两师扩编为第十九路军,由蒋、蔡分任总指挥、军长。中原大战后,十九路军又赴赣“剿共”。

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长胡汉民。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率先南下广州,策动两广联合汪精卫共同反蒋。其时,掌握广东军政大权的陈铭枢与陈济棠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

为了争取陈铭枢反蒋,古应芬等人甚至愿意推举他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铭枢

^① 关于十九路军反蒋的成果有王顺生、杨大伟的《福建事变——一九三三年福建人民政府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吴明刚的《1933:福建事变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肖自力的《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等。关于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金以林的《陈铭枢与蒋介石关系初探——以宁粤对峙初期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7年第1期)对宁粤对峙前两人关系有详细论述。

^②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③ 朱宗震、汪朝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55页。

不为所动。^① 其一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表示“拥护统一,反对内战”,一面主动离粤赴港。陈铭枢再次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了蒋介石。

陈铭枢出走香港令蒋介石深为感动,其复电陈铭枢说“兄既到港,公私皆得转危为安,无任慰感。”^②并在日记中说“忽接真如电称‘不闻变乱至此,故离粤来港’。真如既到港,则公私皆得转危为安。表示粤中内部不一致,则伯南当亦不能附和叛逆也。”^③

然而,蒋介石对陈济棠却无把握。正如陈公博所说“广东的省政府主席陈真如是蒋先生拿得稳的,而总指挥的陈伯南则非靠胡先生和古襄芹先生,不容易拉住他替蒋先生卖力。”^④为了拉拢陈济棠,蒋介石甚至提出将广东军政大权都交付于他。4月29日,蒋致电陈铭枢“未知伯南能有法挽救否,如其为权利计,或为中央不信任故,兄可推其代主省政,而兄自来京就军政或实业一部之职。先安其心,以挽救党国危局,以表示吾人为革命而牺牲一切之正气。”^⑤陈铭枢复电表示:“枢决计远游,粤事请任伯南继任,以全公私。”^⑥为了支持蒋介石,陈铭枢远走日本,拱手将广东省政让与陈济棠。

然而,陈铭枢的出走并未阻止宁粤对峙局面的出现。6月初,在蒋介石的电召下,陈铭枢由日返国,被任命为“剿赤”右翼集团军总司令^⑦,重领十九路军,成为蒋介石“围剿”红军、制衡西南的重要力量。

二、心生嫌隙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主动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和平统一。9月20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陈铭枢等协商办法,并提出与粤方谈判的三项原则:(1)令粤方觉悟,迅集南京加入政府。(2)只要粤方能负统一责任,到达南京,改组政府,则我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断无异议。(3)如粤方以为胡汪蒋合作,则我方亦当不顾一切,完全以国难为重也。^⑧

9月24日,蒋介石派陈铭枢等人赴粤谈判,谋求宁粤合作。然而,陈铭枢赴粤后未能实现蒋介石之谈判目标,反而与粤方达成了逼蒋下野之协议:蒋介石发一通电,为时局危急引咎,并声明议定统一政府办法时立即下野。变更京沪卫戍警卫组织,任命陈铭枢为首都卫戍司令兼淞沪警备

司令,调十九路军卫戍京沪,“此事为和议重要关键,发表之期愈早愈好”。^⑨

蒋介石对陈铭枢等人与粤方达成之协议极为不满。10月1日,蒋在日记中说“下午接真如、子民等转粤逆之意,坚持后面主张,强迫余先通电,是真等于儿戏。国事危急至此,而若辈尚以敌对态度要胁不止,对国内与中央行施压迫,对倭寇则勾结迁就,诚无人心矣。”^⑩当晚,蒋复电陈铭枢等,声称“曾与兄等面定三个原则。……舍此之外,而欲求必有条件相要胁,则于情于理于公于私皆不能通,无异背道而驰,殊非中正所愿闻也。兄等竟忘此三个原则及无条件三个字,而乃来此绝无磋商余地之东电,未知何意,诚令人不解。”^⑪其责备之意跃然纸上。

宁粤双方虽经广州、上海谈判,但蒋介石仍未通电下野。为此,粤方拒绝入京合作。12月10日,孙科则明确对陈铭枢等人重申,召开四届一中全会的前提是蒋介石先下野。^⑫11日,陈铭枢致电蒋介石,告以“胡汉民、孙科等必欲钧座辞职始快。职思当此时机,钧座似亦暂避为宜。”^⑬

陈铭枢之电令蒋介石异常愤怒。其在日记中写道“真如亦受若辈之迷,而未深思国家大计。以余之领袖而坚强之干部,动以退让为得计,内部

^①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48页。

^② 《蒋中正电陈铭枢暂留香港忠告陈济棠俾其悬崖勒马》(4月29日,“蒋档”革命文献,第10册,“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200010009。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31年4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

^④ 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⑤ 《蒋中正电陈铭枢未知陈济棠能否挽救可推其代主省政先安其心》(4月29日,“蒋档”革命文献,第10册,“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200010010。

^⑥ 《蒋电陈济棠如陈铭枢不愿回粤成全其志》(4月30日,“蒋档”革命文献,第10册,“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200010013。

^⑦ “蒋档”《事略稿本》,“国史馆”印,第11册,第255页。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84页。

^⑨ 《蔡元培张继等致蒋介石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二),第773页。

^⑩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2日。

^⑪ 《蒋中正电蔡元培张继于此党国存亡之际求一圆满解决之道特定三原则》(10月2日,“蒋档”革命文献,第14册,“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20200014004。

^⑫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⑬ “蒋档”《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5页。

之心不一,领袖之志难行。然而余不能用人,而干部左右又不能容人,此国家之所以不定也。余对于政治、哲学近得二语,曰:政者进也,贪者退也。领袖欲进,而干部欲退,虽有大力,无以推动也。”^①其他蒋系大员也对陈铭枢甚为不满,李石曾甚至对蒋表示,陈铭枢行为可疑。但蒋认为“真如为人诚而愚,愚者未有不自作聪明,李先生疑其伪奸,亦冤矣哉!”^②此时,蒋介石虽然对陈铭枢甚为不满,但对其忠诚尚未产生怀疑,仅认为陈铭枢是“自作聪明”。毕竟,赞成蒋介石暂时引退的还有何应钦等人。^③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铭枢作为宁方代表在孙科内阁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蒋介石希望他可以牵制孙科内阁,为其复出做准备。对此,陈铭枢说“蒋要我来缓和双方的争议,且早已说明是过渡时期的‘看守政府’性质。”^④然而,陈铭枢不仅未牵制孙科内阁,反而大力支持孙科。1932年1月12日,陈铭枢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力图帮助孙科组织中政会特委会,“处理国难期内一切政务”。^⑤并主张在财政上停付公债本息,在外交上实施对日绝交政策。^⑥

陈铭枢的主张不仅有违蒋介石之本意,且对蒋之地位产生了严重威胁。若特委会一旦成功运作,内外政策必将发生变化,届时蒋介石也恐难以左右政局。因此,蒋介石对陈铭枢之行为既感困惑又感愤怒。他在日记中说“李、冯、陈、李文范等包围哲生,卖空买空,受故指使,必欲对日绝交,停还内债,使中国破产灭亡。余为公为私,对国对友,对总理对旧部,皆不能不出而往救,以尽良知,故决赴京一行。”^⑦不得已,蒋介石只好联合汪精卫共同复出。

重返南京的蒋介石对陈铭枢已不信任。1月22日,陈铭枢前往中央军校拜见蒋介石,但遭其冷遇。^⑧蒋在日记中写道“深夜静思,使政治无状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继,使余整个失败,而强余辞职者,陈铭枢误之也。诚不料其愚庸、贪污、诈伪竟至于此也。”^⑨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已将其“整个失败”归咎于陈铭枢,并用“诈伪”来形容陈铭枢了。

1月24日,蒋汪联手否绝对日绝交方案,取消特委会,迫使孙科辞职。作为孙科内阁重要成员的陈铭枢,其地位异常尴尬,并对蒋汪搞垮孙科内阁极为不满。他说“在那几天,中央党部和政

府(行政院)的各项会议,我虽然照常出席,显然没有前一个时期活跃,担子也轻了许多,不必再为孙科政府去自找麻烦了。”^⑩2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陈铭枢却“借口战事紧急,愤而退席”。^⑪

在对蒋介石不满的同时,陈铭枢也开始怀疑重新上台的蒋介石欲对其不利。他说“要不是有十九路军三万余将士掌握在我的手中,我随时都会步邓演达的后尘,被蒋介石杀掉。我之所以能够保住一条命,还由于淞沪抗战打乱了蒋介石重新上台的内外政策部署。”^⑫陈铭枢的看法虽不免夸张,但却说明双方的猜忌与不信任已是相当严重。

三、走向决裂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坚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主张在对日军进行适可而止抵抗的同时,着重利用列强调停与日直接交涉。在蒋看来,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军对手,十九路军之所以能暂时挫败日军的进攻,是日军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他说“闻沪战事,倭寇攻击甚烈,我方尚能支持,而世人不测,以为真正胜利。其实,倭之海军陆战队在陆上与我陆军作战,其技自穷,而非我军之战斗力胜过于倭。”^⑬2月12日,在徐州军事会议上,蒋氏提出“对于沪事,取缓和,勿使扩大,以保国家元气,以为他日复誓雪耻之图。”^⑭次日,蒋氏再次对何应钦、陈铭枢说“十九路军已经保持了十余日的胜利,能够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好。”^⑮并令何应钦、陈铭枢致电蒋光

①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1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2日。
④ 《陈铭枢回忆录》,第83页。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4页。
⑥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第三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1页。
⑦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5日。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66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6日。
⑩ 《陈铭枢回忆录》,第100页。
⑪ 《陈铭枢回忆录》,第99页。
⑫ 《陈铭枢回忆录》,第100-101页。
⑬ 《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8日。
⑭ 《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12日。
⑮ 《陈铭枢回忆录》,第103页。

鼐、蔡廷锴说“蒋介石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在全盘计划未定以前,仍取攻势防御为要。”^①

然而,陈铭枢却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主张积极增援十九路军抗战,反对与日交涉。2月12日,陈铭枢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表示“和议诚属徒然,民族生机只有不计死亡,持久抵抗。望兄等坚决到底,不为任何当局所动摇。”次日,他再次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说“近日颇有人发议,不忍本军牺牲,无以为继,亟欲设法避免再战,枢极不谓然”,“必须贯彻全军牺牲之初心,以完成民族命运所寄托之使命。”^②20日,蒋介石在励志社召集各要人商谈时局,并强调“不可孤注一掷”,但遭陈铭枢、李济深等反对。^③

在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同时,陈铭枢多次要求增援十九路军。2月12日,陈铭枢请求蒋介石“抽调部队,增厚兵力。”^④20日,陈铭枢再次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上海守军,但均遭拒绝。

2月20日至22日,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在庙行镇击退日军万余人之进攻,但自身亦伤亡严重。23日,日本决定派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团增援,起用前陆相白川义则大将为总司令官。^⑤

面对日军大举增援,陈铭枢派十九路军参谋长邓世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增援。然蒋却表示“各部队俱未集中,何能增援?希嘱蒋蔡诸兄,务照原定计划,迅在南翔之线赶筑工事,以期长期抵抗。至撤退时间,由蒋蔡诸兄查看情形,自行决定。”^⑥蒋不仅拒绝增援,反而催促十九路军按照原定计划,速作撤退之准备。

24日,陈铭枢、李济深面见蒋介石,请求调兵增援,但蒋氏坚持称“我方应仍照原定方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抵抗得有胜利,稍稍退后,即以交涉途径进行,交涉不得胜利,乃再力与决战。是交涉之时,即为我秘密准备抗战之时机也。不过,在此时间不可不少示退让,以表示我确有和平之诚意耳。”^⑦陈、李当即表示反对,但蒋坚持己见。陈铭枢说“蒋介石简直就是在耍流氓。”^⑧而蒋介石却在日记中指责陈铭枢是“亡国而不恤,只图一己之权利与虚荣。”^⑨

25日,蒋介石致电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告以“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东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日不能参加战斗。”^⑩可

见,蒋之意思很明确,即能增援的部队都已调完了,近期内不会有其他部队增援。其实,蒋介石已认为没有必要再增援上海守军,因为他不愿与日军在上海进行决战,使中日冲突扩大。但他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命令十九路军撤退,只能通过不增援的方式,迫使第十九路军知难而退,主动撤兵。

面对日军增兵上海,而我方伤亡日多,又无增援,蒋光鼐于26日下令主动弃守江湾。3月1日,日军发动全线总攻,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伤亡惨重,苦撑至当晚11时,不得不下令退守第二防线。陈铭枢对蒋介石坐视不救、拒绝增援的做法非常愤慨。他说“蒋介石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战,使我同他的矛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决心与蒋介石决裂”。^⑪

四、互相拆台

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陈铭枢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与矛盾并未公开。然而,十九路军在撤退至第二防线后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后援不继”和“援师不及”,使得这种分歧与矛盾公布于众。而十九路军的宣言,更是激起了各界对蒋介石支援不力的指责。甚至连宋美龄都对蒋介石说“上海我军撤退,反动派造谣更甚,军民恐更将归怨于夫子,夫子将成为怨府。”^⑫为此,蒋介石甚是郁闷,对陈铭枢与十九路军更是恼怒不已。

3月4日,蒋介石对陈铭枢表示,“十九路军宣言中有‘因援军不继,以致撤退’,以致外界各种谣言纷起”,但陈铭枢“充耳若不闻,毫不动容,漠然而出”,以致蒋介石大怒。他说“真如可谓全无心肝之人也。此等谣言不仅毁我个人,更且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0页。

② 《陈铭枢回忆录》,第102页。

③ 蒋作宾《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2页。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189页。

⑤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88页。

⑥ 蔡廷锴、蒋光鼐、戴戟《淞沪战斗详报》,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62页。

⑦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85页。

⑧ 《陈铭枢回忆录》,第104页。

⑨ 《蒋介石日记》,1932年2月24日。

⑩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294页。

⑪ 《陈铭枢回忆录》,第102页、109页。

⑫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38-339页。

败我国计。真如纵不爱余,何竟不爱国家哉?昔者陈叔宝视国破家亡若无事,故隋文帝谓为全无心肝,今真如之为人,竟绝类叔宝,殊可痛也。”^①其在日记中说“沪上反动之言,陈真如闻之不动声色,可谓无血心之人也。”^②3月7日,其在日记中再次写道“真如之愚庸则我所知,真如之奸鬼[诡]则我所不知,而真如之能为陈炯明第二是我所万万不及料者也。余诚妄人自以为是,所以至于今日也。真如之被第三党诱引为首领为傀儡而被愚奸,为人利用而不自知,可叹。”^③

因蒋介石视陈铭枢为“陈炯明第二”,所以也疑心十九路军被“反动派”运动。^④3月15日,蒋介石对张道藩说“自沪战以来,民众与第十九路军皆受反动派恶劣宣传之毒,以余为误国之人。”^⑤为了防止陈铭枢利用十九路军反蒋,蒋介石试图拉拢十九路军部分将领,以分化十九路军与陈铭枢之间的关系。4月20日,蒋介石接见蒋光鼐,并要他转告陈铭枢,告诫其不要成为“陈炯明第二”。^⑥25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接见蔡廷锴,并嘱咐蔡“以后须绝对听政府命令”。^⑦之后,蒋介石又召见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副师长张光中,并“循循教诲之”,“光中能善领受余心”,“毛亦表示接受”。^⑧蒋介石的分化,令陈铭枢更加愤慨。对此,陈公博也认为“蒋先生这个手法不独使真如感受彷徨,整个十九路也起了恐怖。”^⑨

面对蒋介石的拆台,陈铭枢也不甘束手就擒,他也开始“策动拆蒋介石的台”。^⑩5月中旬,汪精卫因签订《淞沪停战协定》遭到监察院的弹劾,因而对蒋介石不满。陈铭枢即利用蒋汪矛盾,对汪精卫表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也绝不会相信你,你还是回西南去,先同胡汉民合作吧。”^⑪此外,陈铭枢还利用孙科、宋子文、张静江、李济深等人对蒋的不满,策动他们一起辞职。然而,陈铭枢的活动尚未取得成效时,蒋介石已有所察觉。陈说“我所策划的反蒋计划,因过于幼稚和过早暴露了意图,均被蒋介石所一一击破。”^⑫5月18日,蒋介石决心调十九路军入闽。^⑬6月25日,蒋介石下令撤销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同意陈铭枢辞去交通部长职,“去国放洋”。^⑭至此,陈铭枢的拆台活动以失败告终。然而,陈铭枢的反蒋之志却更加坚定,其在出国前要蒋光鼐和蔡廷锴“专心致力于整顿全闽,作为将来反蒋的基地。”^⑮

五、小结

自宁汉分裂,陈铭枢一直追随蒋介石。然而,在一二八事变前后,陈铭枢和蒋介石的关系却急剧恶化,双方由彼此信任到相互猜忌,最后走向决裂。究其原因,除外部因素外,角色错位与性格多疑均是重要原因。陈铭枢虽长期支持蒋介石,但并未将自己视为蒋之附庸,尤其是宁粤对峙后,陈铭枢则以第三者之身份参与调停,活跃于宁粤之间,为双方所拉拢与倚重。至1932年孙科内阁成立时,陈铭枢已身兼行政院副院长、交通部长、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等军政要职。而蒋介石却仍视陈铭枢为其附庸,期望他能牵制孙科内阁。角色定位的差异使双方由信任走向猜忌。

常理而言,对日抵抗程度的差异并不足以导致将帅失和。然而,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尚未完全复出,对日军事和外交均负责无名,因而其内心极为敏感。加之蒋介石性格多疑,相异的政见往往被视为“反蒋”或有意阻碍其复出。而陈铭枢由于担心蒋的报复,对蒋也多有疑虑。信任的流失和蒋多疑的性格不仅阻碍了两者正常的沟通,使双方对彼此的防范远胜于信任,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两者之间的裂痕,最终走向了决裂与对抗。

[肖如平: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邮编:310028]

[责任编辑:胡震亚]

- ①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347页。
- ②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4日。
- ③ 《蒋介石日记》1932年3月7日。
- ④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491页。
- ⑤ “蒋档”《事略稿本》,第13册,第437-438页。
- ⑥ 《蒋介石日记》1932年4月20日。
- ⑦ 蔡廷锴《蔡廷锴自传》,第296页。
- ⑧ “蒋档”《事略稿本》,第15册,第18-19页。
- ⑨ 陈公博《苦笑录》,第197页。
- ⑩ 《陈铭枢回忆录》,第110页。
- ⑪ 《陈铭枢回忆录》,第110页。
- ⑫ 《陈铭枢回忆录》,第111页。
- ⑬ “蒋档”《事略稿本》,第14册,第393页。
- ⑭ “蒋档”《事略稿本》,第15册,第570页。
- ⑮ 《陈铭枢回忆录》,第112页。